

工作动态

本中心新学期工作会议召开

2002 年 9 月 3 日，本中心在中心会议室召开新学期工作会议，社科部部长罗卫东教授到会指导。会议由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

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五月份会议论文集编纂情况，他说：“五月份的会议十分成功，论文质量也比较高，现经匿名审稿后明确可用的论文有 60 余篇，目前正在准备交出版社排版。”

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通报了中心对外交流的情况，她说：“汉语史研究中心这几年的对外交流十分活跃，特别是两次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国内专家学者交流。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丁邦新院长经过多次协商，已经形成一个备忘录。丁邦新院长还自己出资在汉语史研究中心设立优秀学生奖学金，每年奖励优秀学生两名，硕士、博士各一名，第一笔款项 4000 元人民币已到位。中心和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的友好交流也已经达成初步意向。中心和这些学校的交流包括学术刊物与著作的交流、教师和学生的互访、共同的课题研究等等。”

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通报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国际中国语学会第 11 届年会会议情况，黄笑山教授和陈东辉副教授分别通报了 8 月份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音韵学会的会议情况和在武汉召开的古委会系统青年教师会议情况。

社科部部长罗卫东教授对中心上半年的工作表示肯定，他说全国在文科发展方面已经慢慢形成一股潮流，江总书记的讲话吹响了向人文社会科学进军的号角，浙江大学十分重视人文社科建设，汉语史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重点建设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校更是十分关注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目前中心成员梯队分布合理，实力雄厚，希望中心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团队优势，使其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

田敬诚副处长来本中心视察工作

日前，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田敬诚副处长借在杭州开会之际来本中心视察工作。田处长和中心主任就汉语史中心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对中心上半年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并对中心存在的一些困难提出了具体措施。

兼职教授项楚来中心驻所研究

今年 9 月，本中心学术委员、兼职教授项楚先生来基地驻所研究，在驻所期间，项楚先生还对本中心的两个重大项目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学术交流

王云路教授参加“中国语言文字学 2002 高级论坛”

2002 年 7 月 19 日至 24 日，王云路教授应邀参加由吉林大学文学院和古籍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国语言文字学 2002 高级论坛”，并作了题为“关于古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思考”的大会发言。出席会议的有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各方面的学者 30 余人。

方一新教授参加国际中国语学会第 11 届年会

8 月 19 至 24 日，方一新教授赴日本名古屋爱知县立大学，参加国际中国语学会第 11 届年会，并在分组会上报告了论文《〈抱朴子〉新词论略》。国际中国语学会是唯一的国际性中国语组织，自 1993 年成立并在新加坡召开首届会议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年会，轮流在各大洲召开。欲出席会议者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论文提要，经三位专家匿名审查获得通过后再发给正式邀请。此次年会系首次由日本承办，总计与会的国外（地区）学者 150 多人，日本学者 150 多人，总数达到创记录的三百多，盛况空前。日本方面对会议十分重视，除了东道主爱知县立大学外，日本中国语学会的全体会员

也都积极参与，捐钱出力。尤其是爱知县立大学岩田礼教授、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为办好会议尽心尽职，身先士卒，会议办得很成功。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参加国际中国语学会年会的中国大陆学者人数不多。自去年起，学会修改了有关章程，使得出席本次年会的中国大陆学者人数达到空前的三十多人。明年年会将首次回到中国语研究的大本营——中国大陆召开，由南开大学承办。

许建平副教授参加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

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于 2002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办，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赵和平教授主持会议。本中心副教授许建平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出席会议的有英国、法国、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学者 52 人，会上共发表论文 43 篇。这是提交敦煌学学术史研究论文最多的一次敦煌学会议，并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早期敦煌学学术史的材料。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专门为本次会议举办的“敦煌学学术史”展览，该展览展出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及早期敦煌学家的多种手稿、信函等材料。

陈东辉副教授参加

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青年学者会议

由国家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青年学者会议，于 7 月 4 日至 6 日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 20 余所重点大学的近 70 位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古委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副主任章培恒教授、秘书长杨忠教授等古委会领导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专门讲话。此次会议有两大主题：1、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建设；2、对 21 世纪古籍整理研究的意见、建议和设想。本中心副教授陈东辉博士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我校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专业以及本中心的有关情况，受到古委会领导和与会代表的好评。

黄笑山教授参加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 学术研讨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会议

本中心成员黄笑山教授于 2002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参加了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到会的海内外音韵学研究者一百多人。会议还对汉语音韵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黄笑山在会上宣读了题为《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音位原则》的论文。会议对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改选，黄笑山再次当选理事。

池昌海副教授参加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 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2 年 9 月 6 日至 9 日，我中心池昌海副教授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并宣读了《中国大陆二十年来征婚启事特征变项语言运用变化调查报告》论文。该会由北京语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语文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参加会议的代表有 50 多位，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甘柏滋等在内的多名外国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池昌海提交的本篇论文引起关注，受到好评。

陈忠敏博士到汉语史研究中心讲学

2002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时许，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陈忠敏先生来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举行了题为《汉语史研究和历史层次分析法》的专题讲座。陈忠敏博士就 90 年代初以来他在汉语方言和汉语史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了简要的概述，指出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在汉语史研究中的缺陷，并且用吴语、闽语鱼韵、虞韵的今韵母读音为例着重阐述了历史层次分析法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原则与方法，引起了与会师生的极大兴趣。讲座结束后，部分师生就有关问题与陈博士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董琨教授来我中心讲学

9 月 22 日上午,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董琨教授为中心师生做了题为《汉字的二重性》的报告。他着重阐述了汉字作为符号系统的二重性、汉字起源的二重性或多元性、汉字表现功能的二重性、汉字改革的二重性以及汉字的现状和前途等。其中所涉及的不少内容, 都是使用汉字时经常遇到的问题。董教授对其进行了条分缕析和理论的阐述,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讲座结束之后, 董教授和师生进行了交流。

人才培养

本中心迎来九月新生入学

我中心 2002 级研究生招生工作完成, 新生于 9 月 11 日全部到校报到。本次招生研究生共 18 名, 其中硕士生 13 名, 博士生 5 名。

出版信息

池昌海副教授的《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教程》出版

本中心池昌海副教授新著《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教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是面对中文系以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进一步学习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理论和方法而编写的, 吸收了八十年代以来最新的研究理论成果, 融以作者自己十多年来的教学体验。既有最新的方法体系介绍, 也有结合语言实践所做的运用性分析。在“上编 语法”部分, 强调了现代汉语语法特点以及研究方法体系的介绍, 在“下编 修辞”部分, 强调了修辞研究和分析的结构性, 并有机地将语用学研究成果纳入新的体系, 使分析视野更加广阔, 分析方法也具有现代气息。

王云路教授的《词汇训诂论稿》出版

本中心王云路教授所著《词汇训诂论稿》一书，已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于今年 7 月出版。本书收录了著者从 1982 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共计 32 篇，内容大抵包括：王念孙《读书杂志》研究、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研究、中古汉语词语考释、中古文献整理与辞书编纂、古汉语构词研究等。本书以词汇研究和训诂为核心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陈东辉副教授的《古典文献学论考》出版

本中心副教授陈东辉博士所著的《古典文献学论考》，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今年 9 月出版。本书收录了著者近年来所撰写的有关古典文献学方面的论文近 30 篇，也有从微观角度考证某一部文献或某一位文献学家的。包括《古籍丛书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试论古汉语研究中三重证据法》、《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张元济与中日典籍交流》、《〈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试论长泽规矩也〈支那书籍解题·书目书志之部〉的得失》等。

感谢赠书

日本创价大学教授辛岛静志先生向本中心赠其专著《〈长阿含经〉的原语的研究》及《正法华经词典》、《妙法莲华经词典》；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副教授丁锋先生向本中心赠其专著《〈同文备考〉音系》，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文摘

汉语河流词源考 *

[美国]张洪明著 颜洽茂 邓风平译

[摘要]

中外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河流名称的分布具有区域特征：北方以称“河”为主，南方以称“江”为主，黄河、长江之间地区则有称“水”的。“北河南江”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江、河”词源如何，这一切成了汉藏语言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罗傑瑞、梅祖麟、桥本万太郎等学者为此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假说。他们认为，“江、河”均非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而是分别借自南亚语和蒙古语。桥本万太郎还进一步假设，汉语是南岛语言和阿尔泰语言南北夹击的产物，而“江、河”名称的来源正是在基本词汇方面反映了这一南北推移过程。

上述说法在汉藏语言学界似乎已成定讫，然而，我所作的研究表明，这些假设中有关“江、河”词源的部分有违语言历史事实。本文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历史文献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证明“江”和“河”都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至于别的语言中的相似形式，则可能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

另外，本文在对“江”和“河”作例证性研究的同时，还试图提出区别外来借词和固有基本词的一些原则。我认为，若某词的得名过程与某语言中的固有基本词的得名过程相类似，同时，它在这个语言中还具有一个完整的同源词系统，那么，它就应是该语言的固有基本词。至于外来借词，则不具备这些特点。考察一下汉语“江”和“河”的得名过程，其结果正跟这一标准相合。

一、引言

这篇论文是对汉语河流词源的研究。众所周知：在中国，河流名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固定的模式：河流在北方叫做“河”，例如：黄河、淮河、滹沱河、滦河、辽河等等；河流在南方称作“江”，其例为：长江、湘江、沅江、赣江、闽江、珠江、怒江等等。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有的河流被称为“水”，如：沁水、汉水、沮水、浍水等⁽¹⁾。

为什么河流在北方叫做“河”，而在南方叫做“江”呢？什么是“江、河”的词源呢？我们怎样来说明汉语中河流词汇的地域分布呢？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假设（许 Xu 1939: 183-234; 梅祖麟 1976: 281-283; 桥本万太郎 1978: 77-82; 梅祖麟 1988: 16-22）。根据梅祖麟（Norman-Mei）和桥本万太郎（Hashimoto）的观点，“江、河”均非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而是外来词，分别借自南亚语（以下简称“AA”）和蒙古语。这些假设已被广泛认可。但在本文中，我将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历史文献以及地理学

等方面的材料，对以上主要假设提出异议，并证明“江”和“河”都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同时，还将提出区别外来借词和固有基本词的一些原则，并讨论一些其它相关问题。

二、“河”词源考

1、梅祖麟和桥本万太郎假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梅祖麟和桥本万太郎都声称汉语中的“河”借自于蒙古语，这些假设主要建立在上古汉语中“河”的语音形式 *gal* 和蒙古语中“河”的语音形式 *rool* 的联系上。这些假设也建立在“河”所呈现出的地理分布上，这似乎反映了上古语在中国北方的影响。在上古汉语中“河”的发音被 Karlgren (1957) 构拟为 [g'ar]^②，被李 (Li, 1971) 构拟为 [gar]，被赖 (Rai, 1953) 和 Pulleyblank (1962) 重构为 [gal]。梅祖麟建议的构拟形式与赖和 Pulleyblank 的十分相似。在上古汉语中“河”的语音形式 *gal* 和蒙古语中“河”的语音形式 *rool* 十分相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相似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从逻辑上说，这种相似性给了我们以下几种可能的暗示：(1) 表明汉语中的 *gal* 和蒙古语中的 *rool* 在系谱上有某种联系；(2) 是由本源上无关联的语言经过长期交往接触后形成的；(3) 是在文化或社会层面相互交往中引起的一种语言外借；(4) 不同语言中存在的相似形式是底层（语言）的残留；(5) 仅仅是一种巧合，并不意味着两种语言有任何联系。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有其局限性。例如：假使我们认同了这种说法——汉语中的“河”与其他语言确实有着同词源联系，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在这些相关语言中找到“河”的相应形式和演变痕迹；假如我们认为这种相似性应归因于词语类型学的相互影响，那么它必须符合这个词所关联的地域特色和相关的历史背景这两方面的情况；假如“河”是汉语中外来词，我们应该能说明其外借的方法；假如说它是一种底层的沉淀，我们应该能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找出证明；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假设都应该符合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且必须被历史文献证实。

就“河”而言，有三种可能的假设：(1) 它是蒙古语对汉语影响的结果；(2) 它是汉语对蒙古语影响的结果；(3) 汉语里的“河”和蒙古语里的 *rool* 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结果，两种语言各自的进化中并没有呈现出任何联系。梅祖麟 (1976) 和桥本万太郎 (1978) 主张第一种解释，我的主张正好相反，我认为“河”不是借于蒙古语的外来词，而是汉语中固有的基本词。

2、来自古代文献的证明

“河”在汉语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最古老的汉语词之一。商朝的甲骨文中（公元前 1600-1100），“河”有十种以上的写法。在最古老的中国历史文献中，“河”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曾经统计过“江” *jiang*、“河” *he*、“水” *shui*、“川” *chuan* 在 20 多种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数目（这些文献的时间跨度为先秦到汉魏时期，包括《十三经》（阮，1980）、《国语》、《管子》、《墨子》、《庄子》、《荀子》、《楚辞》、《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列表如下^③：

表 (1) 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江”、“河”、“水”和“川”的数目

题 目	江	河	水	川
《周易》	0	2	20	5
《尚书》	11	28	27	13
《诗经》	9	26	24	7
《周礼》	1	2	16	16
《仪礼》	0	0	1	2
《礼记》	2	6	22	26
《三传》	419	53	52	27
《论语》	0	2	4	2
《孝经》	0	0	0	0
《孟子》	4	9	44	1
《国语》	14	26	---	---
《管子》	12	20	211	21
《墨子》	9	10	50	14
《庄子》	21	14	71	8
《荀子》	10	9	49	6
《楚辞》	18	7	30	5
《战国策》	23	54	---	---
《史记》	339	831	743	278
《汉书》	381	785	1029	307
《后汉书》	506	1184	1086	371
《三国志》	504	357	365	126

表(1)的统计数字显示了古汉语中“河”的四种不同称谓的分布总数,其中“江”*jiang*和“河”*he*用于指代特定的河流(也即,“江”指“长江”,“河”指“黄河”),而“水”*shui*和“川”*chuan*用于通称其它河流。统计表还表明:“河”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因此,说“河”(“黄河”的专称)是一个外借词的说法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3、来自汉语词源的证据

区别本民族固有基本词和外借词的问题在语言学中仍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出区分二者的基本原则:一种语言的固有基本词的命名过程,必定具有某种共同点,并且是在一个完全同词源的系统形成的;然而,外借词的外借过程却不具有这些特性。下面,我将论证汉语中“河”的演变符合这一基本原则,从而证明其正确性。

汉语词源学家普遍认为:一些汉字的词义可以在它们的偏旁中显示出来。假如汉语某些形声字的声旁也兼表词义,这种现象在传统语言学中称为“义寓于声”(也就是说词义寓于声旁)，“河”*he*这个词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证。“河”是一个形声字,声旁是“可”(徐 Xu 1963: 224; 藤 T8d8 1964: 581)。根据我的观察,“河”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大”义。这里,表(2)中提供了一些例子。

表(2) “可”作为声旁的一些汉字

许慎(58-147)《说文解字·门部》:“閤,大开也。从门可声。”(徐 Xu 1963: 248)今南部吴语温州方言仍用此字。

《说文解字·言部》：“诃，大言而怒也，从言可声。”（徐 Xu 1963: 56）

阿，从阜可声，《尔雅·释地》：“大陵曰阿。”（郝 Hao 1982: 第 5 卷、第 2 本、第 18 页）

舸，大舟也，从舟可声。扬雄（公元前 53-公元 18）《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钱 Qian 1984: 20）

柯，大斧柄也，从木可声。《周礼·冬官·考工记》：“车人为车，柯长三尺。”（阮 Ruan 1980: 934）《国语·晋语》：“今若大其柯。”（左 Zuo 1978: 447）

表（2）中的所有汉字的声旁都含有“大”的意义。“河”的本义是“大水”。《后汉书·五行志》中的“河”*he* 被注解为：“披天盖地的大水。”《水经·河水》中，“河”*he* 的意思也为：“最大的水。”这些注解见表（3）。

表（3）“河”是最大的水的名称

《后汉书·五行志》李贤注：“河者，经天亘地之水也。”（范 Fan 1965: 3346）

《水经·河水》酈道元（466-527）注：“河者，水之伯。”（王 Wang 1984: 3）

由此可证，“河”经常是用来指最大的水，这也是为什么上古“河”被用做黄河（中国北方最大的河）的特称的原因。

很明显，“河”有着与其它同源词一样的原始形成过程。因此，汉语词源证明了“河”*he* 是外来词这一假设的错误性。

4、来自蒙古语的反证

在汉语中找到证明以后，我想进一步证明该假设与历史事实的冲突——“河”*he* 这个词在汉语中成形的时间要比 *rool* 在蒙古语中成形的时间要早得多。

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献是《蒙古秘史》，它出版于 13 世纪中叶，可以被认为是古蒙古语的代表文献。从《蒙古秘史》所反映的汉语与蒙古语相对应的语音资料可见（额尔和吴云 E'er&Wuyun 1980），*rool* 在蒙古语中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表示“大河”的专有名词，也不是一个泛指一般河流的普通名词。相反，它仅仅用来表示“小溪流”或“小渠沟”。13 世纪时，在蒙古语中经常用来指称“大河”或“河流”的是 *mü ren*，汉语中与它对音的形式是沐涟。例如，《蒙古秘史》卷一中 *Urshiu müren*（兀尔失温沐涟）是指现在的乌尔顺河（the *Urshiu River*）（额尔和吴云 E'er&Wuyun 1980: 50; 927）；卷三中 *Kilkho müren*（勤勒豁沐涟）（额尔&吴云 E'er&Wuyun 1980: 157; 951）是指清朝（1644-1911）时期的齐兰河（the *Kilkho River*）；卷一续集中 *Shin müren*（申沐涟）是指印度河（the *Indian River*）；至于 *Amui müren*（阿梅沐涟）是指现在俄罗斯的阿姆河（the *Amui River*），即中国西汉（公元前 206 - 公元 24）时期的妫水。

我曾注意到：在《蒙古秘史》中，大河很少被称为 *ula*，相应的汉语语音形式为活刺。例如，《蒙古秘史》卷一续集（额尔和吴云 E'er&Wuyun 1980: 732; 1039）中 *ula* 指现在的松花江（the *Songhua River*）。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rool* 在《蒙古秘史》中甚至不用来指称小河流，而是用 *Ghorkhan* 来代替，它在汉语中相应的形式为豁罗罕。例如：在卷一（额尔和吴云 E'er&Wuyun 1980: 26; 920）⁽⁴⁾中，*Tünggelig ghorkhan*（统格黎克豁罗罕）是指一条被叫做 *Tünggelig* 的小河流；在卷三中，*Tana ghorkhan*（塔纳豁罗罕）是指另一条小河流 *Tana*；在卷一续集中 *Ke'un ghorkhan*（格温豁罗罕）和 *Eke ghorkhan*（额客豁罗罕）是指两条小河，即子母小河（the *Son-Mother River*）；在卷一续

集中 *Altan ghorokhan* (阿勒坛豁罗罕)是指一条叫黄金小河 (the Gold River) 的小河流。这些例子表明直到 13 世纪蒙古语中的 *rool* 还没有成为一个指代河流的普通名词。这一点能在许多其他相关语言编写的语音材料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出版于清朝的《御制满蒙文鉴》(Yu-Zhi 1708) 可为我们提供详细而有价值的满语和蒙古语语音对比材料。例如, 根据材料显示, 满语中的 *ula* 和蒙古语中的 *ike rool* 对应于《蒙古秘史》中的 *ula* (额尔 E'er 1982: 638), 如表 (4) 所示:

表 (4)

《蒙古秘史》 (古蒙语, 13 世纪)	满语 (18 世纪)	蒙古语 (18 世纪)
<i>ula</i>	<i>ula</i>	<i>ike rool</i>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8 世纪蒙古语中的 *rool* 与 13 世纪《蒙古秘史》中 *ula* 意义相同。由此而知, 尽管 *ula* 在古蒙古语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在自己的语言中逐渐地被遗忘, 但是它却在满语中被保留了下来。如, 黑龙江 (the Black Dragon River) 在满语中被称做 *sahali yan ula*, 而且松花江 (the Songhua River) 在满语中被称做 *sungrari ula*。由此可见, *rool* 在历史上直到很晚才成为一个泛指“河流”的普通名词。

关于 *ula* 和 *rool* 在古蒙古语中发展的分析, 我可以进一步用其他相关语言的例子来证明 (蒙 Meng 1955; 道 Dao 1983: 172&176; 照那 Zhaona 1981a: 96&102, 1981b: 96&102; 刘 Liu 1981: 111&118; 钟 Zhong 1982: 93&100; 布和刘 Bu & Liu 1982: 83&90)。如表 (5) 所示:

表 (5) 在阿尔泰语语言中水和江、河的语音形式

Language 语 言	'water' 水	'river' 江	'river' 河	'ditch stream or gully' 溪, 涧, 沟
Mongolian 蒙古语	os	morō	gol morō gol	gœ-t
T'osou 土族语	ʂdzu	muroon	raal	gol
Tung-hsiang 东乡语	usu	dzian	moron	---
East yogor 东裕固语	qusun	mereen	mereen	gol
Dahur 达斡尔语	os	mur	gol	xwarəg
Pao-an 保安语	su:sə	dzian	morung	---
Orochon 鄂伦春语	mu	pir	pirxan	Pərxan
Manchu 满语	mu	ula	bira	biran
Korean 朝鲜语	mul	mul kang	mul hats'ən	cinε kεul

表 (5) 可见, 在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和东裕固语中, 表示河流的语音形式与在《蒙古秘史》中相似。这些形式应被认为是早年蒙古语中分化而来的, 我们把这些材

料和现代蒙古语相比，可以看出其中仍保留古蒙古语的某些特征，如有增音和省略的现象；又如保留了后缀的短元音。以“水”为例，在东乡土语中是 *usu*，而在蒙古语中后缀 *u* 已脱落。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仔细地观察这些语言中用来指河流的词语，就会发现它们和《蒙古秘史》中的词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在东乡语、保安语和东裕固语中，用来指称河流的语音形式很明显是《蒙古秘史》中 *müren* 的各种变体（应该注意的是保安语中 *morung* 仅指黄河）。在土族语和东乡语中表示“渠、溪、沟”的词语之起源与古蒙古语中 *rool* 的起源是一样的。东乡语中的 *dzian*、保安语中的 *dziang* 和朝鲜语中的 *kang* 都是借自汉语江 (river) 的外来词。满语中的 *ūla* 很明显是古蒙古语 *ula* 的遗留。我们从一些相关语言和古文献中得到的这些重要的例子中，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巨大的相似性，表明直到 14 世纪 *rool* 才在蒙古语中开始成为一个表示河流的普通名词。这些例子也显示出 *rool* 在更晚的年代才开始和 *morō* 具有相同的词义。在那之前，甚至直到今天，*müren* 一直被认为是古蒙古语中应用最广泛的表示河流的词。至于汉语中的 *he* (河)，它和 *müren* 这个语音形式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5、来自中国历史地志中的证明

根据历史地志的记载（谭 tan 1982, 1991），“河”的地理分布并非如桥本万太郎所说（1978：77-82）是从北到南，而是以黄河为中心（黄河处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分别向南、向北两边扩散。因此，当以蒙古语为口语的地区仍以“水”指称河流时，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以南地区）的人们已经用“河”来指称河流了。下面我将引用更多的资料来加以说明：

滹沱河(the Hutuo River)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公元 220-280）；大渡河(the Dadu River)和藏河(the Tibetan River)的名称形成于唐朝；汴河(the Bian River)这一名称的形成不会晚于隋朝（公元 586-618）。再如其它河流的名称，如信都河[the Xindu River, 出现在汉朝（公元 206-220）]、五河（the Wu River, 出现在汉朝）、叶榆河(the Yeyu River, 出现在三国时期)、走马河[the Zouma River, 开掘成于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221）]、蒲阳河(the Puyang River, 出现在战国时期)、江南河(the Jiangnan River, 出现在隋朝)，它们都很著名且在古典文献中有记载。可是在宋朝以前（公元 960-1279），位于今内蒙古境内的纳林河(the Nalin River)却被称作弱水。位于今蒙古境内的鄂尔浑河(the Eerhun River)被称作温昆水，如表（6）所示：

表（6）位于蒙古地区的一些河流的名称变化

现今的名称	古代的名称
纳林河	弱水（宋朝）
鄂尔浑河	温昆水（宋前）

除了以上的例子，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楚河(the Chu River)在唐朝时称为碎叶水；阿姆河(the Amu River)在汉朝时称为妫水，但在唐朝时称为乌浒水；至于辽河(the Liao River)和伊犁河(the Yili River)，在宋朝以前称为辽水和伊丽水；滦河(the Luan River)在元朝（公元 1271-1368）以前称为濡水。见表（7）：

表（7）北方一些河流的名称变化

现今的名称	古代的名称
-------	-------

阿姆河	斡水（西汉）
阿姆河	乌浒水（唐朝）
楚河	碎叶水（唐朝）
辽河	辽水（宋朝以前）
伊黎河	伊丽水（宋朝以前）
滦河	濡水（元朝以前）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黄河以北地区的河流在相当晚的时期后才被称为“河”。为了证明汉语曾经受到阿尔泰语的影响，桥本万太郎把 13 世纪蒙古大规模入侵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他假设的历史背景。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河”的名称在中国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商朝（公元前 1600-1100），并且在此后的近古时期被当作一个通用词语来使用。东汉（公元 25-220）诗人郦炎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韩信钓河曲。”李贤作了以下注释：

表（8）

《后汉书·郦炎传》李贤注：“河者，水之总名也。”（范 1965：2648）⁶⁵

6、解决“河”词源问题的方法

在汉语史、古典文献、历史地志和其它资料的基础上，我已经证明了该假设（即将“河”归类于外借词）并没有充分说清楚“河”的起源，因而是站不住脚跟的。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河”是汉语固有的基本词，换言之，它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它的词源不是蒙古语。

三、“江”词源考

1、梅祖麟关于“江”的词源假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梅祖麟（1976：274-277，281-283）声称：汉语中的‘江’是一个外来词。他的假设有两个理由：一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中指代河流的形式与上古汉语中“江”的形式相似；二是“江”在汉语中发展得很晚，并且它的使用局限于一定的地区。下面我将探讨这些假设是否合理。

梅祖麟引用了孟-高棉语中的一些资料，作为其假设的第一个理由的论据。如表（9）所示：

Language（语言）	Form for River（语音形式）
Vietnamese（越南语）	song
Sedang（塞当语）	krong
Bahnar（巴拿语）	krong
Katu（卡多语）	karung
Bru（布鲁语）	klong
Gar（噶尔语）	rong
Koho（科霍语）	rong
Laven（拉斐语）	dakhom
Biat（比特语）	n'hong
Hre（荷人语）	khroang
Old Mon（古孟语）	krung

根据雅洪托夫(Yakhontov,1960)，普雷布郎克(Pulleyblank,1962)和其他一些学者的

观点，上古汉语中的二等字有一个介音，如：-r-或-l-。由于“江”是一个二等字，李(Li, 1971)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 *krung*。从表(9)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南亚语言中，表河流语词的语音形式与汉语中 *krung* 相似。在这里我想再补充另一个例子：在佤语^⑥中表河流语词的语音形式是 *klong*，与 *krung* 也很相似(颜 Yan 1981:65,244-245；周和颜 Zhou & Yan 1984:25 & 165)。

我们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这是由于地理位置相邻而产生的结果呢？还是受到词汇类型学的影响？抑或是词语外借过程中形成的结果？假如属于第三种情况，那么谁是借出者、谁是借入者？且这种语言交流是怎样发生的呢？梅祖麟认为“江” *jiang* 借自于南亚语。

梅祖麟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是语词在外借过程中，借出方中的普通名词会发展成为借入方的专有名词。如美语中的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 和 *wisconsin* (威斯康星)，都借自于阿尔冈金语(Algonquin)。在阿尔冈金语中，这两个词都是普通名词，分别指大河和大湖。一经借入美语中，便成为了专有名词。由于“江” *jiang* 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专有名词而在孟-高棉语(Mon-Khmer)中是一个普通名词，梅祖麟认为，汉语中的“江” *jiang* 是从孟-高棉语中借入的外来词。

上述论点可以从两方面提出疑问，第一，在分析“江” *jiang* 的意义时，梅是用现代南亚语与存在于几千年以前的上古汉语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不够严密，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几千年以前孟-高棉语中的 *jiang* 是一个普通名词还是专有名词。在没有进一步作详尽的阐述以前，梅祖麟就排除了孟-高棉语中的 *jiang* 有可能借自于汉语的可能性，从逻辑上来说，这也是不适当的。应该注意的是，正是在进入上古时代后期不久，汉语中的“江” *jiang* 开始从专有名词转变为普通名词；且在上古后期或中古时期以前，它已经作为一个普通名词而被频繁地使用了。这里有一些选自《庄子》(大约公元前 3 世纪)和《晋书》(公元 644-646)的例子：

表(10) “江”作为一个普通名词的例子

- a. 《庄子·外篇·山木》：“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郭 Guo 1961: 673)
“路途遥远而且充满危险，又有高山和大河，我既无小舟又无车马，该怎么办呢？”
- b. 《晋书·王导(公元 276-339)传》：“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房 Fang 1974: 1747)
“风景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环顾四周，你就会发现江河之中有不同之处。”

在以上例子里，“江”不可能被认作是专有名词^⑦。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也没有找到“江”是借自于南亚语的外来词的例证。我们既找不到 5 世纪以前的任何能证明这个论点——“江”是借自于南亚语的外来词——的碑记材料，又无法用现成的书面文献来证明这个论点；而没有这些材料作为证据，“‘江’是借自于南亚语的外来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⑧。

第二，梅祖麟关于外来词产生过程的描写本身就充满矛盾。普通名词转化成为专有名词的现象在词语外借过程中确实存在，例如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能自然地排除语词采取相反方式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语词外借过程中有很多例证表明专有名词转化成为普通名词。如：*Buddha* (浮图)在梵文里专门用作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的尊称；但是当它被借入汉语时就演变成为一个可以指任何一个和尚的名词，如表(11a)所示；或者指佛塔，如表(11b)所示：

表 (11)

- a. 王安石 (1021-1086)《游褒禅山记》：“唐浮图慧褒始舍於其址。”(王 Wang 1975: 115)
“唐时的和尚慧褒那时在这里居住(址, 这里指华山脚下)。”
- b. 韩愈 (768-824)《张中丞传后叙》：“抽矢射佛寺浮图。”(韩 Han 1991: 201)
“(南霁云)抽出箭来射佛家寺庙上的塔。”

因此, 我们知道, 外来词的演变过程非常复杂, 无法通过一些简单的原则去归纳概括。

梅祖麟阐明支撑他们的假设的第二个原因是“江”发展得很晚, 并且它的使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他们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 “江”并没有在甲骨文中出现, 并且在金文中仅出现过一次, 在《诗经》中也仅在五首诗中出现过九次。假如我们仔细地观察分析, 会发现这些论点其实充满矛盾。“江”没有出现在甲骨文中是事实, 但这就一定意味着它发展得很晚, 或者可以认定它是一个外来词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这种现象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 “江”很难在甲骨文中找到可能是由于我们所能看到的甲骨文的数量有限。至今为止, 我们能认出的甲骨文还不到 2000 个。众所周知, 一种语言如果少于 3000 个语词便不能有效地使用。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现所得到的甲骨文数量并不能反映在商朝使用的甲骨文的全貌。第二, 它可能受到甲骨文记载的内容限制。据我们所知, 甲骨文记载的主要内容涉及占卜算命和宗教活动, 例如向神灵供奉牺牲、钓鱼以及对来年收成和天气的预测等等。河流或许对这些事情无关紧要, 所以在记录中便缺乏这样的词。第三, 象汾、渭、济、泾、汉、洛、汝和淮一样, 在商朝, “江”和“河”是表示特殊河流的专有名称(但是水和川是表示河流的普通名词)。既然甲骨文的容量是有限的, 一些表示河流的名词如“江”在记录时被省略是极有可能的。一些河流的名称如渭、泾、汾、济、汉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目前已利用的甲骨文中; 但是没有人否认这些河流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河流这样一个事实(谭 tan 1982, 1991)。其中, 汾、渭、济甚至没有在西周(公元前 1100-771)金文中出现。假如我们根据梅祖麟的论据来推断, 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些专有名词都看作是外来词呢? 更令我们疑惑不解的是: 梅祖麟不管“河”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事实, 仍断言“河”是外来词。

对于古汉语中“江”的使用频率, 我不仅观察了《诗经》, 而且还观察了其它一些古典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我已经在本文表(1)中汇报过我的观察结果。但是我所提供的数字仅能作为现代研究的参考, 它们并不能用来判断某一个词是否在一定时期普遍存在的情况。

我先前已提到过, 某一个词是否存在于某一篇文章中, 与这篇文章本身的内容、容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屡次出现于相对古老的文章中, 例如《尚书》; 但是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出现于其它一些较迟的著作中, 例如《孝经》不仅遗漏了“江”, 而且还遗漏了“河”、“水”、“川”。尽管如此, 我们显然不能推定当《孝经》成书之时, 这些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很明显, 每篇文章的内容或容量将决定某个词是否被包括在里面。

梅祖麟指出“江”的地域分布折射出一定的地域模式。正如被他们详尽阐述的“江”主要是在楚地使用, 而楚地是古代百越少数民族的居住地。那么, 难道我们就能推断出“江”

不是一个汉语中的固有词，而是借自于百越语的外来词？我认为很难这样说。人类学和历史学相对应的纽带可以作为辅助的证据来证明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纽带本身未必暗示这种联系。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来说，使用两种以上语言是很普遍的；同样，几个少数民族共用一种语言也是很普遍的。例如，瑶族使用两种不同语族里的三种语言。其中包括属于苗瑶语族中苗语支的布努话，属于苗瑶族语中瑶语支的勉话和属于壮侗语族中侗水语支的拉珈话（毛 Mao et al. 1982）。

我不打算讨论那时候生活在楚地——大致位于现在长江流域的南部和中部——的主要少数民族。我想要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楚辞》和《诗经》韵律的相似性足以证明在很早以前汉语已经延伸并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南部和中部地区（王 Wang 1980a, 1980b）⁽⁹⁾。

除了以上我所指出的漏洞外，梅祖麟并没有阐明“江”在孟-高棉语中是一个演变得早还是演变得晚的词，也没有说清楚它形成于什么时期。鉴于以上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可见他们的论据不具有说服力。

2、关于“江”的汉语词源的论证

孟-高棉语中关于河流的语音形式与古汉语中关于河流的语音形式二者的相似性，应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它们具有同样的原始形式，并且从同词源的词根衍生。另一种解释是，它们是语词外借的结果。我的意见是：“江”在不同语言中被同源关系所联接的可能性不大。我相信这是一种语词外借过程的结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是借出者。

根据梅斯佩罗(Maspero 1912)，*s-*在现代越南语是从**cr-*派生导出的，这是古越南语中一个辅音连缀，同样 *song* 是从 *krong* 派生导出的，如表（12）所示：

表（12）越南语中从**cr-*派生导出的 *s-*

* <i>cr-</i>	>	<i>s-</i>
* <i>krong</i>	>	<i>song</i>

既然在孟-高棉语族语言中用来指一些河流的的结构形式非常接近于 *krong*，所以梅斯佩罗用辩证证明 *song* 是从孟-高棉语族语言衍生导出的，梅斯佩罗还正确地指出 *song* 是从越南语中的 *krong* 衍生导出的，并且他的观点已被大多数汉学家所接受。但是梅斯佩罗却不能指出 *song*、*krong* 和汉语中 *jiang* 的联系。这可能是因为古汉语中 *jiang* 的形式在二十世纪初的重构与 *song* 和 *krong* 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值得庆幸的是，最新的汉语历史语音研究成果能够折射出越南语中 *s-*和古汉语中**kr-*（或**k-r-*）两者之间的联系（Bodman 1980; 潘 pan 1983）⁽¹⁰⁾。上古汉语中**kr* 和**k-r-*的重构在中古汉语中分别被修正为 *k-*和 *l-*，如表（13）所示：

表（13）

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i>kr-</i> （卷舌的辅音）	>	<i>k-</i>
<i>k-r-</i> （复辅音/辅音丛）	>	<i>l-</i>

通过仔细考察上古汉语和古汉-越语的关系，可以证明越南语中 *s-*和上古汉语中**kr-*（或者**k-r-*）的联系。如表（14）所示：

表 (14)

汉字	上古汉语	古汉-越语
zhong (肿)	*krjung	sung
shu (竖)	*grjug	so

另外, 还应该注意, 古汉-越语中用 *s-* 作为首辅音的词和汉语中用 *l-* 开头的声符相对应 (王 wang 1948: 460-587; Mineya 1972: 64-161), 例如饬 *chi*, 它从力得声 (从食力声), 它在古汉-越语中发 *sync* 的音。另一个例子是莲 *lian*, 在汉-越语中发 *lien* 的音, 但是在古汉-越语中发 *sen* 的音。一些学者认为 *l-* 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复辅音, 由一个塞音加上一个流音 (即舌尖-齿龈通音) 组成。Bodman (1980) 提出的汉语中 *l-* 的重构形式是 **c-r-*, 而潘 pan (1980) 重构的形式是 **k-r-*。这两种重构形式与 *s-* 从越南语中 **cr-* 衍生导出的事实相吻合。莲 *lian* 有一个音同音近替代字简 *jian*, 这可以从《诗经》中找到例证 (阮 Ruan 1980: 379)。如例 (15) 所示:

例 (15)

《诗经·陈风·泽陂》: “有蒲与简。” 郑笺: “简当作莲。” (《鲁诗》正作“莲”。)

如上所示, *jian* 和 *lian* 在上古汉语中拟音分别是 **kren* 和 **k-ren*,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 *lian* 在缅甸语中的对应形式是 *kra*, 如表 (16) 所示:

表 (16)

汉字	上古汉语	缅甸语
<i>jian</i> 简	<i>kren</i>	---
<i>lian</i> 莲	<i>k-ren</i>	<i>kra</i>

很清楚, 如果追溯越南语中的 *song* 和上古汉语中的 **krong*, 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一形式。以我的观点来看,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于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将在下文中作详尽的阐述。

3、来自汉语语言学上的证据

首先, 根据内部同源关系的例证, 我认为“江”是一个典型的汉语固有的基本词; 它在南亚语中的各种形式, 其中包括越南语, 形成于较晚的时代。

汉语中的“江”在周朝的金文中已被发现, 尽管目前还没有在商朝时的甲骨文中发现它。在上古时代, “江”主要用来做专有名词, 特指长江 (许 Xu 1963: 224; 藤 T8d8 1964: 306), 并且它的得名过程与“河”特别相似。从例 (17) 可以看出:

例 (17)

许慎《说文解字·水部》: “江水, 出蜀湔氐徼外岷山, 入海。从水工声。”

刘熙《释名·释水》: “江, 公也, 诸水流入其中公共也。” (毕 Bi 1936: 28)

张辑《广雅·释水》: “江, 贡也。” (王 Wang 1983: 21)

《风俗通义·山泽》: “所出珍物可贡献也。” (吴 Wu 1980: 373)

上面所列举的解释虽然都不相同, 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暗示一个相同的概念, 即江的演变是和“大水”紧密相联系的。高田忠周 (Takada 1975: 369) 在他的《古籀篇》 (*kochuhen*) 提出了下面的假设:

例 (18)

《古籀篇》: “盖江字从工声, 工疑亦有大义。”

高的假设是合情理的。下面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些从工得声的字¹⁰。

例(19) 以“工”作声符的汉字

《说文解字·人部》：“仞，大腹也，从人工声，读若红。”（许 Xu 1963: 163）

《广韵·平声·东韵》：“仞，身肥大也，户工切。”

《说文解字·缶部》：“缸，瓠也，从缶工声。”此乃瓦制盛器中之大者。（许 Xu 1963: 109）

《说文解字·穴部》：“空，从穴工声。”（许 Xu 1963: 152）《诗经·小雅·白驹》：“在彼空谷。”毛传：“空，大也。”（阮 Ruan 1980: 434）

《说文解字·鸟部》：“鸿，鹄也，从鸟江声。”（许 Xu 1963: 80）《诗经·豳风·九罭》：“鸿飞遵渚。”郑笺：“鸿，大鸟也。”（阮 Ruan 1980: 399）

上面提到的所有的词都含有“大”的意思，特别是鸿。“鸿”从江得声，指最大的一种野天鹅。“江”指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几乎全国半数以上的河流汇聚其中。通过“鸿”与“江”相联系的这些证据（还有其它例证），毫无疑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江”最初是指中国南方最大河流的专有名词。后来，“江”从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通名词，因而常用来指所有的河流。据此，下面的汉字可能是属于同一词族的同源词：**hrwjad* 水，**khrjan* 川，**khlīg* 溪，**kluk* 谷，**klug* 沟，**klwats* 浍，**gluk* 渎，**skljung* 淞，**krung* 江，等等¹¹。在《尔雅·释水》——最古老的汉语同源词典里——列出了“水”的同源词表。我摘抄如例(20)：

例(20)

《尔雅·释水》：“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郝 Hao 1982: 第 8 卷，第 2 本，第 10 页）

如果观察一下如江[krung]、淞[skljung]和例(20)中其余一些词，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通过语音关系而成为同源词。*jiang* 是（从**krung* 衍生导出）某一词族的一部分，这个词族包括了由语音（都是*KR-，这里 K=k, kh, g; R=r, l）和语义（都和水有关）这两方面的相似性而把一些词汇条目连成的一个网络。通过语音的联系来创造同源词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种方法往往一个汉语词族就产生了。然而，外来词在其演变中不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它们也不像汉语固有的基本词一样，有这样一种同源词形成的体系。这种差别说明“江”作为表示“水”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确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汉语语词¹²。

4、来自孟-高棉语的证据

在南亚语中发现的一些资料可以支持我的论据。假如我们把*jiang* 以前的重构形式定为**krung*，那么我们将发现，与*krung* 有关联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南亚语中很不相同。例如在高棉语中，用来指河流的形式是*stung* 而不是*krung*。就语言的地理分布来说，南亚语中表示水的各自形式与其重构形式*krung* 之间的联系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现象。地理位置似乎对这些语言中表示“水”的语音形式与汉语中重构形式*krung* 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假如使用语言地区的地理位置接近中国或越南，那么它们表示“水”的各自的语音形式*krung* 就与重构形式*krung* 很相似，例如巴拿语、塞当语和佉语。假如使用语言地区的地理位置远离中国或越南，那么*krung* 在它们各自的语言中便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例如卡多语、噶尔语和科霍语。对那些使用地区离中国、越南特别遥远的语言，它们各自的形式与重构形式*krung* 如此不同，以致于可以认为它们之间没

有什么联系。如拉斐语中的 *Dakhom* 和比特语中的 *n'hong*。我把这些资料归纳于表(21):

表(21) 南亚语中表示河流的语音形式:

语言	表“河流”的形式
Bahnar 巴拿语	krong
Sedang 塞当语	krong
Wa 佉语	klong
Katu 卡多语	karung
Gar 噶尔语	rong
Koho 科霍语	rong
La?ven 拉斐语	dakhom
Khmer 高棉语	stung
Biat 比特语	n'hong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孟-高棉语族所有语言中,既不能发现与 *krung* 有同一来源的语音形式,也看不到与 *krung* 相应的语音模式。因此 *krung* 不可能是孟-高棉语族语言中固有词。相反,与 *krong* 相应的发展规则却可以很容易地在汉语方言中找到与它对应的例证,它的历史演变能在这些语言中得到清楚的解释。这表明南亚语中的一些语音形式很可能来自汉语。让我们以佉语为例。佉语在中国边界线以内使用,但属于南亚语族。很明显佉语中表示河流的 *klong* (“河”)和 *rom* (“水”或“河”)都是外来词。*Rom* 很明显借自泰语,我们可以把泰语中“water”(水)的形式和佉语中 *rom* 的形式作一比较。如表(22)所示:

表(22) 泰语中表示水的词的语音形式

语言	表“水”的形式
North Chuang 北壮语	ram
Bao-ding Loi 保丁黎语	nom
Weng-ang Puyi 文昂布依语	ram
Thai 泰语	nam

表中所示的例子都属于泰语中表示“水”和“河”的基本词汇(梁 Liang 1980; 欧阳和郑 Ouyang & Zheng 1980; 韦和谭 Wei&Tan 1980; 喻 Yu 1980; 张 Zhang 1980)。它们不但发音相似而且用法也相同。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佉语中(颜 Yan 1981; 周和颜 Zhou&Yan 1984), *rom* 指大江的频率比 *klong* 高,例如 *rom krong* (澜沧江)、*rom krum* (滚弄江)和 *rom sary* (小黑江)。鉴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认为使用更为广泛的 *rom* 是一个外来词;但毫无疑问,不怎么流行的 *klong* 也是一个外来词。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 *rom* 借自泰语而 *klong* 借自汉语。

既然 *krung* 不是孟-高棉语中固有的基本词,那么被传统认可的 *song* 来源于孟-高棉语族语言的说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都借自汉语。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从历史地志中找到证据。

5、来自历史地志的证据

根据《史记·南越列传》(司马 Sima 1959: 2967-2978),《史记·东越列传》(司马 Sima 1959: 2979-2984)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班 Ban 1962: 3837-3869),从

先秦到西汉时期，越人的居住地漫延分布在从交趾到会稽的广大地区。如果 *jiang* 来自古老的百越语，它应该在中国南方百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河流名称中反映出来。可是，在下面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南方的河流，特别是大的河流到很晚的时候才被称作 *jiang*。让我们以位于中国西南边界上的澜沧江为例，从西汉到南北朝时期（公元 420-589）被称做“兰仓水”，到隋朝时期仍被称作“澜苍水”，直到唐朝以后人们才开始称之为“澜沧江”（谭 Tan 1982, 1991）。澜沧江名称的变化可以在下表（23）中折射出来：

表（23）澜沧江名称的变化

兰仓水（西汉到南北朝时期）→ 澜苍水（隋朝）→ 澜沧江（唐朝到现在）

还有许多相似的例证。例如，云南和西藏境内的怒江从西汉到元朝被称为“周水”，元朝又更名为潞江，直到清朝才被称做现时的名称“怒江”。其它一些河流如郁江、东江和北江，都属于同一粤江流域，在元朝以前它们分别被称为郁水、河源水和漓水，直到元朝以后人们才开始用现在的名称。云南和贵州境内的南盘江在唐朝被称为“温水”，直到元朝才叫现在的名称。从秦朝（公元前 221-206）开始湘江一直被称为湘水，直到清朝才有现在的名称。漓江，从三国到明朝（公元 1368-1644）都被称为漓水，直到明朝才有现在的名称。赣江，在西汉和西晋时（公元 265-316）先被称为湖汉水，然后更名为赣水，最后直到清朝才称为赣江。至于雅鲁藏布江，在三国时先叫藏曲，其支流分别叫工曲和娘曲，后来在隋朝名称被改为雅曲，在唐朝又叫藏河，在北宋（公元 960-1127）又叫藏布，最后直到清朝才被重新命名为雅鲁藏布江，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上面所提到的河流的名称从水、河或其它形式一直到江的转变归纳如下表（24）：

表（24）中国南方一些河流名称的改变

周水（汉朝—元朝）> 潞江（元朝）> 怒江（清朝—现在）

郁水（元朝以前）> 郁江（元朝以后—现在）

河源水（元朝以后）> 东江（元朝以后—现在）

漓水（元朝以前）> 北江（元朝以后—现在）

温水（唐朝）> 南盘江（元朝以后—现在）

湘水（秦朝—明朝）> 湘江（清朝以后—现在）

漓水（三国—明朝）> 漓江（明朝以后—现在）

湖汉水（西汉—西晋）> 赣水（西晋）> 赣江（清朝以后—现在）

藏曲（三国）> 雅曲（隋朝）> 藏河（唐朝）> 藏布（北宋）> 雅鲁藏布江（清朝以后—现在）

假如 *jiang*（江）源于南亚语，并且通过百越语这个媒介借入汉语，它的历史发展应该折射出从南向北的运动变化。换句话说，*jiang*（江）首先应该在中国的南方或西南方广泛使用，然后逐渐渗透到长江流域。可是，来自历史地志上的证明却正好显示出它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长江和它的支流最先被称做“江”，然后南方的一些河流逐渐也改名叫 *jiang*（江）^④。有趣的是：南方河流改名为江的次序取决于它们离长江的距离。换句话说，那些离长江近的河流系统得名“江”要早一些，而那些离长江远的河流得名“江”要晚得多。例如，粤江的位置与其它河流相比离长江最远，所以它最后一个改为现在名称（或许是在元朝以后）。在这点上还应该注意的：粤江流域是受百越人影响最大的地区。在古代，大部分的越南河流也被称做“水”，例如黑水河在汉朝

叫劳水；红河在同一时期曾经叫濮水和麋水，在这些名称中找不到 *jiang*（江）的痕迹。至于在南亚语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有相关例证的书面文献，唯一可以参考的是地理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南亚语中表示河流的各种形式与重构形式 *krung* 之间相似性程度取决于这些语言与汉语或越南语在历史和地理联系上的紧密性。应该说明的是，从历史和地理两方面来看，越南语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其它南亚语发展了它们与汉语的联系。以上我所提出的所有证明显示，“江”的源头在汉语。

6、关于“江”(jiang)源于泰语假设中的问题

我已经排除了汉语中的“江”借自于南亚语或越南语的可能性。现在我将讨论其它两种关于“江”的起源的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徐（徐 Xu 1939, 1941）提出来的。他声称“江”来源于泰语。据徐所说，泰语中最小的河流（即溪流）叫 *huei*；那些比溪流大一点的叫 *nam*；再大一点的叫 *ta*；最大的叫 *kjiang*、*klong* 或 *khong*。他据以着重证明“‘江’(*jiang*)从 *krung* 派生导出”这一论点的证据是越南最大河流的名称——湄公河(the Mekong River)。

我已经收集有关语言方面的资料，这些语言包括北壮语(Northern Chuang)、黎语(Loi)、布依语(Puyi)、水语(Sui)、卡门语(Kam)、傣语(Dai)、毛南语(Mao-nan)、仡佬语(Mulao)、仡佬语(Kehlao)、拉珈语(Lakia)、泰语(Thai)、佬语(Lao)等等（韦和谭 Wei&Tan 1980: 103; 欧阳和郑 Ou&Zheng 1980: 109; 喻 Yu 1980: 85; 张 Zhang 1980: 89; 梁 Liang 1980a: 89, 1980b: 95; 喻和罗 Yu&Luo 1980: 110）。在这些语言学材料的基础上，我将在下面说明徐的假设是不可靠的。

第一，根据我的研究，*ta* 和 *nam* 是最普通的用来表示河流的名词，在泰语中它们从来没有区别大小河流的功能。这二个词唯一不同点在于，前者(*ta*)仅有“河”(river)一个意思，而后者(*nam*)有两个意思——“河”(river)或“水”(water)。与这两个相对应的词能在所有泰语言中找到。我同时还发现泰语中经常用来表小河流的词是 *mə:ng* 或它的各种变形，它们的分布远远超过那个 *huei*。就 *huei*（即溪流）言，我相信它借自南部吴语或闽语中的 *xi*（溪）。至于泰语中的 *ta*，一些学者（罗 Luo 1983）认为它是汉语中 *tuó*（沱）的词源，但是我认为汉语中的 *tuó* 借给了泰语中的 *ta*。

第二，南（或喃）——一个汉语中的书写形式——被用来作为泰语中 *nam* 的音译（任 Ren 1954），并且在说泰语的地区用来指河流或其它地方。例如南俄河（the Nam Ngum River），南俄河应该音译为俄河，因为 *nam* 意思就是“河流”；但是在比较随意的翻译中却被译为岩河(the Rock River)，因为 *ngum* 的意思是岩石(rock)。老挝语中也有一些相同的例子，包括南乌江(the Nam Ou River)、南通河(the Nam Theun River)、南康江(the Nam Khan River)、南利河(the Nam Lik River)、南渡河(the Nam Tu River)、南塔河(the Nam Tha River)等等。严格地说，它们各自应该被翻译成如下形式：乌江、通河、康河、利河、渡河和塔河。我在缅甸语中也找到了相似的例证，如南赖河(the Nam Laie River)、南卡江(the Nam Ka River)、南汀河(the Nam Thin River)、南汉河(the Nam Houn River)等等。另外，还有大量的缅甸地方名称具有 *nam* 这个形式，如 *Nam kham* 南坎（意思是金河，the Gold River）、*Nan pa ka* 南帕卡、*Nan peng* 南蓬、*Nan wen long*

南温弄、*Nan shang* 南商、*Nan ao* 南沃等等：所有这些地方都位于河边。地方名称具有 *nam* 形式的例子在泰国更普遍，如 *Nam mun* 是一条大河的名称，*Paknampho* 是泰国中西部的一个城市。在泰语中 *Paknam* 意思是河口，其中 *pak* 指“口”，泰国的许多地方都以 *paknam* 命名，这些地方都座落在河口。在中国的广西、广东省，以“湍”来命名河流和地名同样也是很普遍的。屈大均不知道湍字的真正意思，因而在他的《广东新语》(Qu 1700: 89) 中作了错误的解释，摘录如下：

表 (25)

《广东新语》：“湍字称惟琼独有，他处无之，岂以琼在天下之南，水名多以南者，其犹曰南方之水欤？”

湍(*Nan*)仅仅在海南岛使用，而其它地方绝对不存在，难道是因为海南岛位于中国的南方，河流大多数以湍 (*nan*)命名，这样湍就意味着南方之水吗？

事实上，所有这些地方名称的湍 (或南)都是泰语中 *nam* 的音译。

第三，泰语中最大的河流被称为 *kjang*、*klong* 或 *khlong* 是不正确的。梅祖麟 (1976: 280) 声称泰语中 *khlong* 的意思是“运河、水道”或“灌溉沟渠”，而不是大河。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它的意思是口岸或港口 (港湾)。既然 *klong* 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语，因而它在泰语的方言分布中受到了限制。*Kjang*、*klong* 和 *khong* 从两个不同的源头派生，即 **kl-*和 **kr-* (李 Li 1977)。这两个开头辅音的演变可呈现如下形式：

表 (26)

<i>*kl-</i>	>	kl, kj, tc, k
<i>*kr-</i>	>	kr, kh, h, l

第四，泰语中河流经常用 *nam* 命名，但是最大的一些河流被称为 *maenam*，而不是 *klong* 或 *khong*。例如泰国最大的河流湄南河(the Maenam River)的全称叫 *Maenam Chao Phraya*。其中第一部分 *maenam* 意思是“河”，后面的部分 *chao phraya* 意思是“母亲”。因此它的音译应该是 the Chao-phraya River；但是较随意的译法则是“母亲河”(the Mother River)。这种翻译形式常用于一些主要支流的名称，如，*Maenam Nan*、*Maenam Yon*、*Maenam Wang*、*Maenam Ping* 和 *Maenam Datshin* 分别被译为难河(the Nam River)、容河(the Rong River)、旺河(the Wang River)、滨河(the Ping River)和他真河(the Datshin River)。这些汉语翻译准确地表明 *maenam* 的意思就是“river”。

第五，湄公河(the Mekong River)是徐的假设中唯一例证，但却是不恰当的。在泰语和老挝语中，湄公河的全称为 *Maenam Khong*；因此在汉语中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公河”，在英语中应该是 the Khong River (而不是 the Mekong River)。假如我们试图转写 *Maenam Khong* 中每一个音，那么其结果在汉语中应该是湄南公河，在英语中应为 the Menam Kong River。如果 *kong* (或 *khong*) 的意思是“河”，那么在“湄南公河”和“Menam Kong River”中它的翻译形式只不过是 *maenam* 的音译重复，而 *maenam* 是泰语中表示河流的固有词。不管怎么样，对 *kong* (或 *khong*) 来说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它的意思不是“河”(river)，要么它就是一个外来词。假如 *kong* (或 *khong*) 不是外来词，那么在字对字的翻译中，不必要的重复就不会发生；假如它是一个外来词，那么它只能通过广阔的水域，从湄公河的上游借自汉语，也就是说借自澜沧江(the Lancang

River)。假如我的假想正确，那么其相互影响的时间不会早于唐朝。因为唐朝以前澜沧江被称为澜沧水，而湄公河名称出现的确切年代几乎要到现代（陶 Tao 1973）。

第六，正如我早先提到的，对历史地志的研究表明“江”*jiang* 的地理分布扩展并不是从南向北。换句话说，它并不是从说百越语的地区向讲汉语的地区逐渐地推移，真正扩展的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整个上古时代，百越地区称河流为“水”要比称之为“江”普遍得多（甚至在中古时代的早期亦如此）。我想在这里补充说明的另一个例子是“余干水”——一条三国时期东南地区最大的河流。“余”是百越语中人所共知的表示地方名称的典型的前缀（徐 Xu 1939, 1941；罗 Luo 1950）；因此，这条河流的名称明显地遵循了这些语言的发音规则。如果“江”*jiang* 也象“余”*yu* 一样，是一个从百越语衍生导出的词，那么这条河应该叫余干江而不是余干水。

上述所有例子都证明了“江”*jiang* 既不是一个汉-泰语的词源，也不是百越语在汉语中的残留。假如说汉字“江”*jiang* 和泰语中的对应词有什么联系的话，那或许是汉语对泰语影响后的结果。

7、对“江”(*jiang*) 源于藏语假设的评价

另一个关于“江”*jiang* 的假设是，它和藏语中的 *klung* 同出一源，这是潘(Pan, 1992 年私下交流)提出来的，我对这个假设有两点意见：

第一，正如梅祖麟（1976）指出的，汉语中的二等字对应藏语中的 *-r-* 而不是 *-l-*。所以，汉语中的“江”*jiang* 和藏语中的 *klung* 同出一源是不可能的。尽管梅祖麟在这点上正确的，但是其观点并不完整。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古汉语和古藏语中 *-l-* 与 *-r-* 之间在形态学上交替的可能性(Bodman 1980)。这种中缀相互交替的痕迹可以在古汉语中找到例证。例如药 *yao*，从乐得声，而昱 *yu* 则从立得声。

第二，藏语中应用最广泛的表示河流的词是 *tchu*。*Klung* 的应用并不普遍，实际上它的应用仅局限于一定的地理区域。雅鲁藏布江(the Yarlung Zangbo River)作为西藏最大的河流，在唐朝以前被称为“曲”。直到今天，很多河流在说藏语的地区仍被称作“曲”。汉语中的曲 *qu* 与藏语中的 *tchu* 的音相对应，*tchu* 或许正从 **tl-* 中衍生导出。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 *klung* 从古代开始可能用来指大河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一些学者指出，*tchu* 或许来源于 **kl-*（潘 Pan 1992）。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关于“江”*jiang* 在汉语和藏语中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考虑了。但是眼下我想把这一设想暂且搁置不提。

四、进一步的讨论

这一节主要回答评论者提出的问题。

第一类和第二类评论者都认为“河”*he* 和“江”*jiang* 都是史前的外来词，年代大致确定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但后来的汉学家却认为“河”*he* 和“江”*jiang* 的词源问题需要小心处理。如果这些词都是史前的外来词，我同意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后期学者的陈述结论。然而，我们能否确信梅祖麟论述的关于河流在南亚语和蒙古语中的词源形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000 年？请注意 *rool* 在蒙古语中开始用来表示河流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 1300 年。同时应指出，梅祖麟用来论述“河流的南亚语词源”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现代词典（梅 Norman-Mei 1976: 276）。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甚至无

法推断河流的南亚语词源在 1000 年以前是什么模样,更不用说 3000 年以前的情况了。而汉语中的“江”*jiang*和“河”*he*至少早在 1500 以前就已经从专有名词转变成普通名词了(即魏晋时期[公元 220-420])。

关于“江”*jiang*的词源,第一类评论者也曾提到“江”*jiang*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地理分布状态,并提供了下列评论资料:(a)孔颖达(公元 574-648)在《尚书·禹贡》篇里“九江孔殷”一段中写道:“然则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长江南部的河流,不论大小,通称为江)。”(b)李兆洛(公元 1769-1841)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是官方历史地名词典,它是根据地名最后一个字来编排索引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查出所有以“江”结尾的河流名称。这使我们确信:(i)孔颖达的论断是对的;(ii)作为表示河流的普通名词,“江”自北向南进展,即从长江开始,就象中国移民群向南方迁移一样。

基于下列理由,我对上述这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孔颖达所说的(阮 Ruan 1980: 149)是唐朝的情况(7-9 世纪),但是“江”*jiang*和“河”*he*在汉语中从专有名词转变为普通名词至少早在六朝时期(公元 266-581)。照此来看,孔颖达这里所说的正如同我们将从今天的角度去推论一样不可信。

第二,众所周知,唐宋学者最容易犯的通病是他们在分析先秦作品时往往用当时的思想和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古典作品(以今律古)。例如唐朝陆德明《庄子·外物》注释,他在《经典释文》中写道:“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黄和邓 Haung&Deng 1988: 396)。他用唐朝时的眼光而不是先秦的眼光考虑问题。另一个例子是朱熹(公元 1130-1200),在他对《诗经·关雎》注释中,他在《诗集传》第二行对“河”的解释是:“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朱 Zhu 1958:1)。很明显,朱熹解释错了。尽管宋朝“河”是一个表示河流的普通名词,但在先秦“河”却是专指黄河的。同样,当孔颖达驳斥他的先辈并指出“江”是中国南方表示河流的通称时,他正用唐朝的情况去解释先秦的问题。

第三,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事实上是一部地理名称词典而不是河流名称词典。这部词典里有 69 个带“江”字的名称(李 Li 1969: 118-127),但它们都是城市、乡村或要塞名称,而不是河流名称。即使我们把所有 69 个带“江”的地名都看作与河流有关(换句话说,它们的命名过程与河流有关),那么第一类评论者所说的结论仍然是错误的。当然,69 个地名中的 44 个来自宋朝以前的历史文献,其余 25 个来自宋朝或宋朝以后的历史文献,这 25 个地名可以放在一边暂且不谈。44 个宋以前的地名中有 20 个地理位置在长江的北岸,如卢江、九江和乌江;其余 24 个在长江南岸,如罗江、清江和连江。因此,从李兆洛的词典获得的资料首先与讨论的题目毫不相干,并且不能证明孔颖达的论断和“江”*jiang*的用法的演变。

第四,第一类评论者进一步争辩说,假如“江”*jiang*是一个固有的汉语词,那么很难解释从《诗经》到唐朝这 1400 年间为什么没有一条长江北部的河流被称为“X 江”,毕竟,中国北方有许多条大的河流。我想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根据张僧鉴的《浔阳记》(约 5 世纪)和张须缘的《缘江图》(约 5 世纪)^⑤,至少早在晋朝,长江北岸的许

多河流已被称为“X江”，例如乌白江、蚌江、乌江、嘉靡江、畎江、源江、累江、提江、三里江、五州江、乌土江等等。

第五，第一类评论者声称，如果“江”*jiang* 借自于南亚语，那么其扭曲的地理分布就能得到解释。当汉人向长江南部地区迁移时，他们混合了南亚语，并养成了使用 **krong (jiang)* 作为通称表示河流的习惯⁶⁹。但是我对此持不同的意见：假如“江”*jiang* 作为河流的通称从北向南推移，就象中国移民向南迁移一样，为什么不可能是汉人挈带他们的汉字“江”*jiang* 一起向南推移、渗透呢？

事实上，就移民涉及到的问题，仍然能支持我的观点。有两类移民与这个论题相关，一类为百越移民，另一类是汉人。百越移民从周朝开始（公元前 1100-221）从长江下游迁移到南方地区，他们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越南等地区。百越人这种大规模的南迁活动到西汉时期（公元前 206-公元 24）已经完成。而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南迁移发生在晋朝（公元 265-420），他们散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等。在唐朝（公元 618-907），汉人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在宋朝（公元 960-1279），汉人第三次大规模南迁。经过这三次迁移，汉人从北部地区蔓延到了中国南部的部分地区。关于移民对一个词传播的影响有三种符合逻辑的可能性，而其中两种最能使人信服：(i)百越人带着他们的百越语随迁移传播；(ii)汉人带着他们的汉语随迁移传播。可是应该指出的是：汉朝以前“江”*jiang* 主要用来指长江，在百越人居住的地区很难找到“X江”或“江X”结构的例子，而要在他们移民过程中所经过的地方找到这样的例子也是很不容易的（除了“长江”以外）。即使我们采纳梅祖麟的观点，即“江”*jiang* 是百越语里的一个词，那么那时它仍是一个专有名词。因此，梅祖麟关于“‘江’*jiang*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对应一个普通名词”的讨论是不切题的（梅 1976: 281）。很清楚，“江”*jiang* 的意义的变化和发展与百越人的迁移毫不相干。从晋朝（公元 265-420）起，“江”*jiang* 开始演变为普通名词，南方地区的河流也开始逐渐地得到“X江”的名称。这些发展与汉人从北向南的迁移时间恰好相合。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江”*jiang* 是作为一个汉语词，被汉人带到南方来的。

第六，在仔细查看东南亚地图后，我发现很少有河流的名称被称作“*krong X*”的。我认为在一种语言里，通常会有几个不同的词用来指河流，正象在佉一崩龙语（属于南亚语系）、泰语、蒙古语和汉语中的情况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些词比其它词使用更为广泛。我从东南亚地图上收集到的资料表明，*krong* 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尽管它的意思是河流。

第七，我将在下面用更多的资料来进一步证明我的观点。众所周知，百越语的词序是修饰语在中心词的后面，特别在表示地名和河流名称时更是如此。在广东、广西、海南岛，仍然有许多的地名表现出这种特点。另一方面，修饰语位于中心语前的词序则一定是汉语结构。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1950: 59-62）里收集了 63 个“那X”、40 个“都X”、50 个“六X”等结构形式的地名⁷⁰。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水语》（1630-1696）中收集了 17 个使用“滴X”结构形式的海南岛地名（屈 Qu 1700: 89）。这里的 *nan* 是一个名词性主导词，意思是“水”或者“河流”。如果“江”*jiang* 最初是南亚语或百

越语中的词，那么它的结构应该是“江 X”，而不是“X 江”。然而，从古到今没有任何这样的例证。下面是亚洲河流名称词序结构模式：

表(27) 中国河流名称的词序

- a. “X 江”——主要在南部地区使用，例如：长江。
- b. “X 河”——主要在北方地区使用，例如：黄河。
- c. “X 川”——主要在西南、西北地区使用，例如：大金川。
- d. “X 水”——主要在中原地区使用，例如：汉水。
- e. “X 溪”——主要在福建和台湾地区使用，例如：建阳溪。

表(28) 东南亚地区河流名称的词序

- a. “Mae Nam X”或“Menam X”——在泰国和老挝指大河，例如：MaeNam Songkhram 和 Menam Khong 湄公河。
- b. “Lam X”、“Nam X”或“Rom X”——在泰国、老挝、缅甸和佤一崩龙语中指普通河流，例如：Lam Se Bai、Nam Ngum（南亥河）和 Rom Sary。
- c. “Sông X”——在越南北部地区使用，例如：Sông Ma。
- d. “Sé X”——在越南南部地区使用，例如：Sé Pone。
- e. “Stǎng X”——在柬埔寨使用，例如：Stǎng Chinit。
- f. “Sungai X”——在马来西亚使用，例如：Sungai Pahang。
- g. “Batang X”——主要在马来西亚东部使用，例如：Batang Kemena。

表(29) 《蒙古秘史》中河流名称的词序

- a. “X ula”——指大河流，例如：Sungrari ula。
- b. “X mtren”——指普通河流，例如：Kilkho mtren（齐兰河）。
- c. “X ghorkhan”——指小河流，例如：Tana ghorkhan。

南亚语系的词序是中心语—修饰词，确实为南亚语词源的地名和河流名称都显示出这种次序。如果“江”*jiang*象*nan*一样是一个借词，我们预期的应该是“江 X”（而不是“X 江”），就与“*nan X*”完全一样。为什么汉语的使用者要把汉语词序强加在某些特定的外来语表达方式上，而不是强加在其他所有的外来语表达方式上呢？Xenic的支持者将面对这个问题⁽⁸⁾。

五、结束语

在这篇论文里，我提供了大量的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例证来驳斥关于“江”*jiang*和“河”*he*是外来词的假设。通过这些例证和分析，我证明了“江”*jiang*和“河”*he*都是汉语中的固有词，也就是说来源于汉语内部。至于上面所论述的“江”*jiang*和“河”*he*在别的语言中相对应的形式则很可能借自于汉语。要补充的是，我已经提出了我所推出的区别外来词与汉语词源的一些原则，它是词族的一部分，这个词族包括了一个通过语音和语义上的相似点联系起来的词项的网络。

注释：

* 本文原载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26, Number 1, January 1998. ——译者

* 我非常感谢 William S.-Y. Wang (王士元), Tsai-fa Cheng, Yafei Li, Shangfang Zhengzhang (郑张尚方), Rujie You (游汝杰), Wuyun Pan (潘悟云) 和三位不知名的评注者, 是他们为这篇论文的初稿给予了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也感谢 Christine Colby 和 Matthew Splitk 的善意帮助。我将乐于表达对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研究院 (1996/1997 年夏季研究基金) 和美国 Chiang Ching-Kuo 国际学术研究基金会 (1997-1998 研究基金) 的衷心感谢。他们的资助对这篇论文的完成起了重大作用。

⁽¹⁾ 这是基本情况, 当然有些例外, 例如: 在北方有黑龙江和松花江, 在南方有红水河, 但是所有这些名称都是在相当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

⁽²⁾ 为了方便起见, 本文中省略了所讨论例子的音调标记。

⁽³⁾ 水在这里有好几种意思, 包括“河流”、“液体”、“洪水”, “水”是五行之一。

⁽⁴⁾ 在《元史·太祖本纪》(宋 Song 1976: 2), 它被译成统忽里忽鲁, “忽鲁”与 *ghorkhan* 的音相对应, 意思是“小河”。

⁽⁵⁾ 《后汉书·酈炎传》: “韩信钓河曲。”(范 Fan 1965: 2648)

⁽⁶⁾ 佞语在中国的边境内使用, 但属于南亚语系中的佉一崩龙语支。

⁽⁷⁾ 这里我们先不管“江”*jiang* 在《尚书·禹贡》(阮 Ruan 1980: 148-149) “三江既入”和“九江孔殷”里的表达是专有名词还是普通名词,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江”在 (10a) 和 (10b) 中仍很难被认为是专有名词。

⁽⁸⁾ 第一类评论者认为我把书面文献的优先权和语言里的优先权混淆了, 并且认为我的观点是——有文字的语言不可能从没有文字的语言里借用。这是不正确的。我既没有声称或暗示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比没有文字记载的语言高级, 也没有声称或暗示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不能从没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中借用词语。我所尝试做的是通过各种方法搜集所能找到的证据并列举可能存在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所有合乎逻辑的可能性, 不管这些语言是否有文字记载。但是, 一种没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的原型是否只能通过一种方法进行重构, 我相信这一点几乎不可能被查证或证明其虚假性, 该原型的时间尤其如此。确认原型的时间主要是通过年代学的方法 (Swadesh 1952: 452-63)。但我认为这种方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 这种方法的结果表明汉语中的闽方言形成的时间比吴方言早, 但是根据历史文献和移民资料, 吴方言要比闽方言形成得早。这些牵涉到许多有趣的问题, 并要求我们做更详细的研究。然而, 这一例子所反映的某一点是很清楚的: 年代学的方法确实不完全可靠。事实上, 我不同意梅祖麟假设的原因并不是南亚语系的语言没有文字记载, 而是我所引用的依据能证明其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注意的是, 即使梅祖麟本人也意识到并且承认他们的方法缺乏坚实的基础。在他们的论文中梅祖麟承认: 无可否认地, 我们的基础不甚牢固, 因为我们找不到有关南亚语系语言——我们相信中国南方人曾经操这些语言进行交流——的任何记载 (梅祖麟 1976: 276)。

⁽⁹⁾ 《楚辞韵读》里有 30 韵部 (王力 Wang 1980b: 454-565); 《诗经韵读》里有 29 韵部 (王力 Wang 1980a: 124-449)。

⁽¹⁰⁾ 根据 Bodman (1980) 和潘 (1983), **kr-* 是辅音, 是由卷舌音形成, 并且 **k-r-* 是一个真正的辅音缀。

⁽¹¹⁾ 第二类评论者对“江”的意思解释为“大”表示怀疑。藤堂明保说音符 (也就是 *gong* 工) 的意思是弯曲的枝条。或许还有许多其他解释“江”的方式, 他们都建立在以音表意这样一个论点之上。上面所有论述都是晚期的。应该考虑的是如下的事: 我在这里当作例子的所有汉字都保留有“大”的意思吗? 另外它们都具有声旁 *gong* (工) 吗? 虽说 *gong* (工) 在甲骨文和金文里是一个弯曲的工具形象, 但是它还有许多引申义和假借义。当我们说在形声字里用 *gong* (共) 作声旁包含有“大”的意思时, 这意思并不一定是本义。在更加普通的意义上, 许多含有声音结构的汉字 [*k/g/ŋ - ŋ/g/k*] (也就是音节首为 *k-*、*g-* 或 *ŋ-*, 并且音节尾是 *-ŋ*、*-g* 或 *-k*), 都含有“大”的意思, 如广 (*broad*)、巨 (*huge*)、阔 (*enlarge*) 等等 (Karlsgren: 1934; 汪 Wang: 1982c)。在上古时代巨是 [*g-g*]、阔是 [*k-k*]; 且巨 *ju* 和工 *gong* 具有同源联系。巨 *Ju* 源于工 *gong*, 也有 [*k-ng*] 的结构形式。当人们说形声字的声符表意时, 他们是在讨论形声字的形成过程中字形的构成原则。这与这些学者或他们的解释出现得早或晚不相干。

⁽¹²⁾ 这些上古形式的重构与李 (1971)、郑张 (1980)、Bodman (1980)、潘 (1983)、Baxter (1992) 以及其它一些人的观点一致。

⁽¹³⁾ 感谢第三类评论者加强了这一观点可信度。

- ⁰⁰ 通过对中国南方一些河流命名为“江”的过程和顺序的解释，很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江” *jiang* 呈现出扭曲的地理分布。南方的河流被称为江，仅仅是因为受了这个地区最大的河流（扬子江）的名称的影响；北方的河流被称为河，也仅仅是因为受了那个地区最大的河流（黄河）的名称的影响。实际上，这个原因已被指明并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石 Shi: 1979; 王 Wang: 1982a, 1982b; 陈 Chen: 1982; 和李 Li: 1984）。
- ⁰⁵ 《浔阳记》和《缘江图》已不存在。但其片断在陆典明的《经典释文》里仍然可以看到(黄和邓 Huang&Deng 1988: 40)。
- ⁰⁶ 第三类评论者对这个问题持有相似的观点。
- ⁰⁷ “那” *na*、“都” *du* 和“六” *liu*，在这里的名词里都用作主导词，在川东 *chuang-tong* 话里被拼写为 *na*、*ta* 和 *lu:k*，而各自的意义分别为“田野”、“水田”和“流域”。
- ⁰⁸ 第三类评论者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并指出这种解释的责任落在了 Xenic 支持者的身上。